

新诗海外传播的 当代性反思

冯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诗海外传播的 当代性反思

冯
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诗海外传播的当代性反思/冯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 - 7 - 5203 - 4732 - 7

I. ①新… II. ①冯… III. ①新诗—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957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李坤阳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冯强，1982年生于山东青岛胶县（现胶州），文学博士。受业于耿占春教授和张清华教授，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先后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写作教研室主任。现主讲新诗和文学写作课程。

“广西一流学科·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经费资助成果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经费资助成果

本书为2016年国家重大招标项目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ZDA218）；

2018年国家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8ZDA279）。

目 录

绪论 向“道”与取“势”：新诗海外传播的立场与视域	1
第一章 新诗海外传播的状况	22
第一节 新诗海外传播基本状况	23
第二节 新诗海外传播的媒介、渠道与方式	35
第三节 新诗海外传播个案研究	46
第二章 新诗海外传播的情境与问题：文化、政治的偏离与错位	59
第一节 “文明的冲突”及其背后的宗教因素	62
第二节 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传播变形	79
第三节 变异与正名：对一种“国际化写作风格”的反思	83
第四节 新诗海外传播对策研究	110
第三章 他者的选择：西方视野中的新诗	122
第一节 西方中心论的德国例证：以顾彬为例	124
第二节 作为世界诗歌的阅读视野：以柯雷为例	135
第三节 “场域”理论视野中的观照：以戴迈河为例	147

第四章 如何走向世界：中国当代诗人海外传播的个案研究	165
第一节 在世界诗坛的形象建构：以杨炼和西川为例	168
第二节 在欧洲发明中国：以多多和张枣为例	179
第三节 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改写： 以孙文波和臧棣为例	194
第五章 新诗的“当代性”反思	224
第一节 “现代性”作为“当代性”的问题情境	224
第二节 现代诗歌观念的终结	229
第三节 虚待的激情：身体和客体的复活	233
第四节 主观个体的重建	239
第五节 诗可以群：作为“同时代性”的“当代性”	243
结语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中国当代诗人的 第二次起航	249
参考文献	258
附录	
“我希望得到从容” ——对顾彬教授的访谈	265
更重要的是要容有“百家” ——戴迈河访谈	296
最好是有真理，有风格 ——对汉学家凯勒先生的访谈	312
后记	319

绪论 向“道”与取“势”：新诗海外传播的立场与视域

史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言：“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关于“传播”，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言论之一。“著”“藏”“传”三步乃成中国古代士人的名山事业，“知音”的悠久传统回荡其间。这也是一个被羞辱被去势的士人的向道之心。名山渺莽千秋业，大地苍茫七尺身（康有为《苏村卧病写怀》三），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谭嗣同《夜成》），这样一个歌哭传统绵延至今，让人浩叹。黄宗羲曾言“史亡而后诗作”，意谓诗歌对历史薪火的护航价值，而诗歌传播史上，中国人将最高的荣誉给了杜甫——“诗圣”或者“诗史”——乃是因为历史在中国的地位恰似宗教在西方的地位，洞若观火，一字褒贬，杜诗正是这一传统的最高代表。

杜诗在历史中的传播流变可以为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当代在海外的传播提供某种参照。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杜牧《读韩杜集》）。诗歌传播涉及至少两个主体，即诗人和读者，能挠到读者的痒处，说明诗歌的真魅力。韩愈在《调张籍》中为当时的贬杜之风所激愤，为老杜正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贬杜和护杜都是

杜诗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从杜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看，他的诗歌无疑是成功的、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演变到今天，老杜的诗不仅是历时的传播，它早已传播到海外，获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如今，信息以光速传播，我们要研究“新诗的海外传播”，又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但无论问题如何繁复，都需要了解何谓“传播”、传播何以可能、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传播的效果几个问题。

“传播”在古代汉语属于同义连言，意谓广泛散布。比如《北史·突厥传》：“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再如《唐才子传·高适》：“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为传播吟玩。”请注意，前面的例子是传播者占据主位，后面的例子则是传播的受众占主位。同时，“传”是纵向，面向时间，“播”是横向，面向空间，“传播”即是联通时空，无远弗届。英语中“communication”起源于拉丁文名词“communis”和拉丁文动词“communicare”，后者带有“建立共同看法”（to make common）的意思。和“传播”紧密相关、有相似语源学出身的词语还包括“社区”“宗教教派”“共同性质”“地方自治主义”以及“共产主义”^①。从词源上看，“传播”在欧美文明中有更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属性，“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传播意味着‘分享’‘相通’”^②，美国一些传播学者比如詹姆斯·凯瑞、斯科特·莫罗径直将传播等同于文化^③，另外，法国的传播学者比如阿芒·马特拉和多米尼克·吴尔敦更多将传播和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后者宣称，言及传播必然言及民主，传播与“自由和平等的双

① 陈力丹、易正林：《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法]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刘昶、盖莲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③ 陈力丹、易正林：《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5页。

重意愿”分不开。^① 吴尔敦将规范性和功能性视为传播的两大向度，前者重理想，分享和彼此理解是其最大理念，后者重事实，与技术进步相关，有实用主义倾向，二者是传播活动的双螺旋。他的这一双螺旋是一个悖论：针对欧美社会过于强调传播技术的倾向，吴尔敦直截了当地提出“信息不等于传播”，因为“信息传递只涉及讯息（message），而传播活动则涉及关系”^②，传播总是朝向一个他者，总是涉及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就是说，传播（communication）和信息（information）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后者可以独立存在，而前者必须有他者的存在和双方的相互认可才会有意义。欧洲历史上存在信息和传播上的两次革命，前者发生在19、20世纪，其中心问题是建构信息自由，后者发生在21世纪，其目的已经不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之见分享共同的观点，而在于让通常相左的世界观和平共处”^③。前者以流通的自由度和速度为准则，后者则是迟缓的，其准则是学会共处。在今天的欧美，吴尔敦说信息是文化共处中最直接也是最危险的阵地之一，需要“外交、文化和无形知识等的共同努力，以避免无处不在的信息及其交换的速度最终成为战争和误解的加速器”^④。因为欧美人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将信息的流通速度和传播的迟缓结合起来。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相比现实的厚度与深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我们认知上的费解和行动上的迟缓，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世界无疑已经成为“地球村”，但对人、文化和世界观来说，我们无疑停留在“巴别塔”的状态。吴尔敦认为当今之世，传播必须通过弱化传播的技术和工具来进行，即我们必须通过去技术化和去工具化来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经验，要重新引入文化、政治和历史内容，

①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刘昶、盖莲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9页。

②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信息不等于传播》，刘昶、宋嘉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

④ 同上书，第51页。

重新找回技术系统后面的社会意义，这是传播革命（不是信息革命）的首要条件^①，也是他的双螺旋悖论。技术在他看来是最明显也是迄今最让人满意的传播层面，最有前途的则是传播的经济层面，它随着贸易和技术同步增长，最复杂、最难破译和驾驭的则是文化层面^②，也就是不同主体的经验和价值观层面，本论文所要处理的，恰好集中在文化层面。当然，作为不同于欧美的社会环境，在讨论新诗的海外传播时，我会将制度层面作为重要的背景，但不打算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吴尔敦也未将制度问题作为重点来研究，原因不同：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几百年间，欧美社会最重要的任务都是争取“我”的权利^③，而到了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则是“他人”，是如何处理好“我”与“他人”的关系，处理好“我”与“他人”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传播，如果无法传播，“我”与“他人”又该如何实现共存。“只有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最重要的理想获胜之后，传播才成为可能”。21世纪传播革命的任务之一则是认识到“无法传播”也是“传播”的一部分，甚至是将无法传播现象作为传播现象的前提来思考，“拯救传播”即意味着反思传播、无法传播以及无法传播之后如何共处。

在讨论“诗歌的传播”问题时，韩东就说，“它在最根本的地方，是不可能的，确实是不可能。你没有必要让一个人，非得把你觉得好的东西奉为至宝，这十分有问题。让他能像你一样去了解，我觉得除非他有主动性，他没有主动性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④ 除去被传播的内容（指涉物，本论文中指新诗），传播涉及至少两个主体，即传播是一种关

①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信息不等于传播》，刘昶、宋嘉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在今天看来，这些都再自然不过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将其遗忘。只有当我们游历于专制政体的地盘时，才会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多么难能可贵。”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刘昶、盖莲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④ 姜涛、韩东等：《当代诗歌写作的现状与传播的可能》，《飞地》2012年第1辑。

系。当这种关系不平等时，一方可以强迫另一方接受所传播的内容，也许这种传播更恰当的说法是“宣传”或“灌输”；当双方处于一种平等关系时，传播又面临着另一个悖论，即传播受众成为潜在的，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传播的不可能在于我们无法了解一条水中的鱼是否快乐，而在传播可能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提升鱼儿生存所倚赖的环境吸引鱼儿自己游过来。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者的主动性，我们能做的，也唯有耐心培养一个促进他者主动性的环境。因为被指涉的内容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它可以参与建构传播双方的自我意识。传播的两个矛盾向度，即“一个是自由的向度，另一个是与他者建立真正关系之困难的向度”^①。说到底，我们可以将传播的可能区分为制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前者指向自由，即“能否选择”，后者指向文化，即“选择什么”，也就是历史学家秦晖所说的“‘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②。举个简单的例子，1954年，有中国人询问黑塞是否允许翻译他的作品，黑塞回绝了，“我回信告诉他，当今的中国禁止了孔夫子和老子的书，或者不希望他们存在。我不愿意见到我的书在一个现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民族经典的国家被翻译”。^③ 中国禁止孔子和老子的书传播是制度，黑塞拒绝自己的书在中国出版则是文化，因为这是他基于自己的选择权作出的决定。具体到新诗的海外传播，涉及的中国当代诗人和海外读者自然是关系平等的两方，中国当代诗人基本有权决定写什么，海外读者则有权决定接受与否。

出现上面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传播的内容——包含了传播者的经验以及经验所承载的价值观——会影响到潜在的接受者接受与否。张清华认为新诗的海外传播涉及两个基本前提，即代表着人文主义精神的普世价值和“传播的

①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拯救传播》，刘昶、盖莲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 根据这个思路，“中国传统”也被秦晖区分为“传统文化”还是“传统制度”。秦晖：《文化无高下 制度有优劣》，《凤凰周刊》2006年第8期。

③ [德] 孚克·米谢尔斯编选，赫尔曼·黑塞著：《黑塞之中国·序》，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根本内容”即本土经验：“西方人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本国文学’，中国人民也同样不需要‘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①。而不同制度和文化下的确可以产生出精神气质相似的诗歌作品。试举岳重 1971 年的《三月与末日》为例，其首句“三月是末日”与艾略特“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岂止是神似，“而当时的岳重绝无可能知道世上有艾略特其人及其作”^②。再比如柏桦曾经发现韩东 80 年代初《向鞋子致敬》等诗与英国诗人拉金的相通之处，他借用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思想，以《同写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韩东和拉金诗歌的比较》一文来解释这一现象。^③ 总结起来，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经验是新诗海外传播的重中之重。孔子、老子的书自然能代表中国经验，但它们同样具有普世价值，否则不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些被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姆称为“憎恨学派”的学说出现之后——越来越被怀疑和殖民主义是一丘之貉。在各种持“西方中心论”的学者看来，即使新诗的传播者是中国当代诗人，在一个西方评价标准占主导的世界文学格局中，传播的主体仍然是被西方的凝视所控制和决定的。这又显示出新诗海外传播中的某种“宿命意味”，即传播者是根据隐含传播受众的目光和取向来完成自身的传播定位的。传播受众的趣味先验地决定了传播的内容。这种情况笔者并不反对，在第二章第三节就是通过对欧阳江河的《凤凰》来分析这一先验传播类型。但是需要提醒读者，情况可能要复杂许多。在《凤凰》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用以向西方读者示好的“一神”，也能看到这些年占尽报纸版面的中美合作（所谓“G2”或者“中美国”）或者中美对抗，而这些可能就是为国内读者准备的消费符号。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最有力的恐怕还是西方

① 刘莉娜：《当代文学如何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上海采风》2011 年第 7 期。

② 多多：《雪不是白色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926549/>）。

③ 柏桦、余夏云：《同写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韩东和拉金诗歌的比较》，《文艺研究》2007 年第 9 期。

内部，比如就列奥塔就曾指出所有“西方语言游戏”里给出的命题“都包含了一组张力，每个张力都影响到它所涉及的语用学位置，即发话者、受话者和指谓”^①，而每个游戏特有的规则必然会造成游戏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它构成了自西方起源开始的整个文化帝国主义史”^②。警惕“西方中心论”固然不错，但应该避免它对其他话题的符号化、空洞化，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③，其中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义者”比亨廷顿更加信奉“文明的冲突”（参第二章第一节），甚至以毁灭整个西方文明为目标，这是不是可以视为过分夸张“西方中心论”的恶果呢？欧洲的汉学家比如德国的顾彬或者荷兰的柯雷，都会强调“西方”内部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顾彬（参第三章第一节），德国观念主义和德国精英立场在他身上非常明显，他视神学和哲学为他真正的故乡，实际上这是“文化德国”（“文化”和“文明”的争执在德国有很长的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他用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标准也有大日耳曼或者泛欧洲论的倾向，他一贯的反美，是他这一德国精英立场的注脚。黑塞说：“我们对东亚，应该至少像我们长期以来对待近东一样，将他当作我们的老师（只要想想歌德是怎样做的！）……我们无需拿《老子》代替《圣经》，但《老子》让我们明白，在另一苍穹下，比我们更早的时候，类似的思想出现了，这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不管民族与文化差异多么大、多么敌对，人类仍然是个大统一体，可以共享相同的机会、理想和目标”。^④ 人类，尤其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文明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吗？仍然以黑塞为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人，而在内心当

① [法]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7、98页。

③ [荷] 布鲁玛、[以] 玛格里特：《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张鹏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德] 孚克·米谢尔斯编选，赫尔曼·黑塞著：《黑塞之中国》，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在另外的地方，黑塞将其称为“文化的国际性能力”。

中，我们也根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能在中国和在任何一种往昔中寻找生活的理想和最完美的形象，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并将自己禁锢在一种模式之中。我们必须在自身当中发现中国，或者说发现中国对我们的意义，并将它们保持下去。”^① 无论是黑塞的德国经验还是我们的中国经验，如果二者之间没有某种普世价值的桥梁，那么传播就没有意义，连传播的可能都没有。

“如何传播”的问题更复杂，我会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进行具体的讨论。“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古谚固然不错，但在信息以光速传播的今天，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稍一偏差就可以使有可能惺惺相惜的中国当代诗人和海外读者擦肩而过。他们持有类似的价值观甚至表达习惯，但是生活在物理距离遥远的不同地方。民国时期吴经熊和美国大法官霍姆斯通信中的一句话可以启发我们：“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心如火烧，渴望着国际和平。我宁愿碎尸万段，也不愿意看到人类在下一场战争中毁灭。在巴黎，我常常看到可爱的法国孩子在广场上抽陀螺，我想，可爱的德国孩子也一定在广场上抽陀螺。有朝一日，这些孩子长大了可能成为好朋友，但也可能相互射杀，想到这些，一种悲哀的感觉就会笼罩我的内心。”^② 这句话把不同制度和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不同主体之间交流的困境凸显出来。新诗的海外传播虽然还没有上升到“成为好朋友”或者“相互射杀”的程度，但是诗人和读者之间一段美好机缘的造就本身就是一桩善事。善事无小事。在资料的搜集和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处处感受到这种机缘的存在。以当今的网络为例：澳大利亚汉学家西敏（Simon Patton）将伊沙送给他的《伊沙诗选》中部分诗歌译成英语，并发布在他编辑的“国际诗歌网”上，促成了伊沙接到参加第38届鹿特丹国

^① 转引自马剑《黑塞与中国文化》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周伟驰译，雷立柏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际诗歌节的邀请，这一机缘被他归因为“网络时代的特点”^①，另外西敏还根据自己的趣味把浙江诗人方闲海（1978— ）、“下半身”写作诗人盛兴（1978— ）以及网络诗人水晶珠璣（1981— ）等人的诗歌翻译为英文放到国际诗歌网上，让我们意识到新诗是如此丰富。另外汉学家戴迈河也有浏览中国诗歌网页的习惯，从中决定翻译哪些诗人的哪些作品，新诗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网络传播到海外去。值得一提的是，戴迈河还把他的博士论文发布到莱顿大学汉学系的官方网站，他希望此举可以吸引中国本土的学者也能参与进他的讨论当中，我本人就是从网络获取了他的论文，我借此学习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并且在与戴迈河的多次互动中得到了关于国内诗坛和国际诗坛的诸多启发。

“传播的效果”可以从两方面去了解。首先是从传播者的影响力或者所谓“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又或者按照布尔迪厄，从“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角度，这些角度都是从隐含的权力（power）出发，要求他人的尊敬和欣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象征资本。这一点程光炜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中有集中阐释。他主要考虑了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的，他担心中国当代作家在创作上会过于期待和依赖在西方处于边缘位置的汉学家们的评价；另外他关心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中的听众层次和范围，海外报道这种消息的媒体到底是小报小刊，例如华人报刊，还是主流媒体。“如果听众层次和范围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种‘小圈子’里的传播，或叫‘内部传播’”^②。另一个角度是从传播受众的意愿出发，由他们自己“拿去”，这其实是文化上的“馈赠”。

① 伊沙：《鹿特丹日志——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侧记》（<http://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22/2385.html>）。

② 程光炜：《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8期。

说到底，“传播”一事，最根本的动力是对方自身的需求，比如来到中国的美国诗人欧康奈尔，学习中文、翻译新诗、和中国当代诗人交往、为国外杂志编选新诗，还“自己也打算编辑一本诗集，专门介绍8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希望这两项工作对中国诗歌在美国的传播有所帮助”。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回报中国古代诗人曾经对我的馈赠”。我想，这样的传播才是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真正了解、尊重中国文化的海外读者会真心实意回报中国，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任驻中国外交官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于1920年写往巴黎的信中谴责巴黎和会对中国权利的无视，^①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也于1921年在《关于中国的思考》一文中对延续巴黎和会精神的华盛顿会议表示谴责。^②佩斯和黑塞肯在中国处在危难的时候为中国伸张正义，而且表现出先知般的洞察力，虽然那时他们人微言轻，毕竟难得，再一次证明了一个健康的（国际）政治秩序需要将诗歌容纳进去。这是不是应该视为对中国古代文化海外传播的一次馈赠呢？

围绕“传播”诸问题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秦晖对“制度”和“文化”的区别，即“‘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再以玄奘西行取经为例，《西游记》第十二回载唐僧得到皇帝批准，出征前还从唐太宗手里接过袈裟和禅杖两件宝物。而“据史料记载，唐贞观元年玄奘就陈表唐太宗请求允许西行取经，但当时却未获太宗批准。然而此时玄奘决心已定，于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最终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完成了历史壮举”。^③

① “我为可怜、不快乐的中国所担心的一切终于发生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侮辱无以复加：……山东一向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摇篮，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圣地。全中国的眼睛都关注着这个省份。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和会竟然没有一个体会到，山东问题这种不公正的处理会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不出十年，我们会感受到这些后果的冲击……”（1920年4月21日），转引自凌沧洲：《检讨五四——西化的歧途》（<http://blog.renren.com/share/325675731/4158614085>）。

② [德] 孚克·米谢尔斯编选，赫尔曼·黑塞著：《黑塞之中国》，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③ 阿拉门1：《唐僧取经要皇帝御批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bee47010006qm.html）。